

引 言

19世纪中叶 鸦片战争爆发 长期闭锁的中国国门 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然打开，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各国帝国主义势力长驱直入全国各地，绵延两千余年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逐渐演变成了由多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与本国封建王朝相互勾结、共同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国家积贫积弱，任凭帝国主义肆意宰割，面临的是苦难深重、极度屈辱的悲惨前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清王朝惨败。翌年被迫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将苏州辟为新的四个通商口岸之一。1897年，《中日通商苏州租界章程》订立，在盘门外青旸地辟日租界。日租界以东设立公共租界（公共通商场）。日租界内设领事馆、警察局、学校、邮局等机构，日本人握有行政、司法、治安、财税等特权。1896年设立的苏州海关，实权完全操纵在列强手里。从开关到1919年苏州关12任税务司，全由英、美、日、葡、俄等国人员担任。在进出口税率上，列强强迫清政府确认低进（3%~4%）高出5%以上的所谓“协定税率”。所得关税收入绝大部分作为偿付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赔偿”及对外借款的担保而落入洋人腰包。

租界和海关的设立，为各国商品的倾销和资本的输入洞开大门。自1896年到1919年，列强各国在苏州设立了工商、交通、保险等企业33家。苏州城乡，洋货充斥。仅据1919年统计，各国通过苏州海关输入的舶来品达数百种。从棉纱、火油、卷烟、火柴到仁丹、味精、缝衣针等滚滚而来。火油、卷烟等商品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州缫丝、纺织等手工场颇具规

模。1895年，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举办的苏纶纱厂、苏经丝厂诞生，开创了苏州现代工业的先河。以后，又有一批工厂陆续问世。可是，弱小的民族工业在列强商品倾销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以棉纱为例，1898年至1903年间，仅日纱就占了中国市场的50%以上，国产纱受到排挤，苏纶纱厂在此期间亏损白银31万两。其他行业也大体相似。尚在襁褓中的民族工业奄奄一息，濒临夭折的危险。

号称鱼米之乡的苏州农村，在封建官僚、地主的重重盘剥和洋米、洋面、洋布的冲击下，也逃脱不了日趋凋敝、江河日下的命运。连绵两千多年“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受到破坏，土地兼并加剧，两极分化加深。五四运动前夕，常熟全县160万亩耕地，60%集中在1000多户地主手中。太仓占农户总数1.7%的地主，却占有全县47.5%的土地。从1905年到1914年，昆山县的自耕农由占26%下降为11.7%，佃农由占57%上升为71.7%。吴县占农户4.5%的地主握有全县180万亩农田的80%。破产后的广大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或加入城市无产阶级队伍，或沦为农村的无产者——佃雇农。他们受尽剥削和压迫，终年辛劳，所得无几，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牛马不如的生活，苦苦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伴随着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占领和掠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还实施了文化侵略。20世纪初，西方教会势力在苏州城区建立的天主教、基督教教堂就有26座。同时，设立大学1所、中学11所、小学12所、医院6所。尽管它们披着种种伪善的外衣，但终究遮盖不了其文化侵略的本质。正如一个西方传教士在建立东吴大学时坦言：“通过中国人民思想上文化上的基督化，而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以奴役中国人民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殖民文化与以宣扬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相掺合，形成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特有色彩，统治着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贯穿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像两座大山那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残酷地压迫、剥削、奴役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和分裂的状态。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以前，长达80年的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才使得帝国主义没有能够灭亡中国。

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从1851年至1864年14年的斗争中，有10多年时间以江苏为革命风暴的中心，它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封建统治。1911年，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政制度，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是，由于农民阶级并非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革命的彻底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明确、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这两场革命最终未能取得胜利。辛亥革命后，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取了革命胜利果实，于1915年企图复辟帝制。但是他的“洪宪”帝制丑剧刚刚开场，便遭到全国人民和内部各政治派别的反对，结果他在愁苦之中一命呜呼。从此，中国进入了各派军阀长期混战的时期，中华民族的危机愈来愈深重，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

在此期间，苏州人民先后卷入了上述两场革命风暴。太平天国运动中，苏州一度成为苏福省省会所在地。苏州人民配合太平军与李鸿章所部清军及戈登所率外国侵略军“常胜军”展开激烈的战斗。辛亥革命前后，苏州民主运动活跃。武昌起义后，配合同盟会在沪宁一线的活动，苏州一度宣布独立，驻苏州的清王朝江苏巡

抚衙门换上了江苏都督府的牌子，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统治权力由封建王朝手里转移到了封建军阀手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无数次地方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例如，1905年针对美帝强迫清政府续签保存虐待华侨条款而引起的抵制美货的斗争；1905年至1910年鞭线业、花农、牙商、酱业、洋广货业、钱典业、纱缎业等为反对清政府对外滥借洋债、对内横征暴敛、搜括民脂民膏而引起的抗捐税斗争；1906年至1911年由苏州绅商发起，联合全省共同反对美帝妄图攫取沪宁线筑路权的“苏路风潮”；1915年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斗争；等等。农村抗租斗争和饥民暴动，更是层出不穷。例如，1910年吴县香山、吴江平望、黎里、芦墟、震泽一带农民因抗租捣毁自治（警察）局及绅董房屋的风潮；1911年昆山、常熟、昭文、沙洲及吴江同里、吴县横泾等地成千饥民抢劫米行、当铺、富户的暴动；澄锡虞三县交界处农民组织‘千人会’同心抗租的斗争等等。但是这一场场斗争也都因缺乏正确的领导而告失败。

在广大人民坚持英勇斗争的同时，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提出了各种救亡图存的主张。素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苏州，此时也涌现了一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志士仁人。如早期提出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主张的冯桂芬、王韬，支持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变法维新的同治（光绪）帝师翁同和，辛亥革命前后以结社、集会、办报、讲课等形式传播反清爱国思想，积极鼓吹革命的黄摩西、庞树柏、章太炎、朱梁任、包天笑、柳亚子、陈去病等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尽管同其他先驱者一样，他们也未取得成功，但他们的革新进取精神，仍值得后人敬仰和称道。

苏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始终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暗无天日。人间天堂，只不过是少数野心家、冒险家和富豪缙绅的乐园，对劳苦大众而言，则是地狱。

然而，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世界革命和进步的潮流不断冲刷着旧中国，茫茫黑夜中逐渐透出一缕缕希望的曙光。

曙光之一是有了新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它开始诞生于 19 世纪中叶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中。到了六七十年代，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队伍得到了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此时，中国产业工人有 200 余万人。苏州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到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了棉纺、缫丝、丝织、电力、造纸、火柴、制皂、碾米、食品、印刷、邮政、电信、航运等一批企业，诞生了第一代产业工人。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非常集中，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之深，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因此，他们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自然成为中国革命新的领导者。

曙光之二是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以前，指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虽然在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中，它起过进步作用，可是因为世界历史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武器业已陈旧落后，不能解决中国现实的矛盾。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无产阶级先进的科学思想体系，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指路明灯，一旦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必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思想武器的出现，昭示着一场荡涤旧世界，创立新中国的新的民主革命风暴即将席卷中国大地，领导这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5 ~ 1927.7)

从 1919 年到 1927 年的 8 年间，中国历史经历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历了 1921 年 7 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经历了国民党新右派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的突然袭击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苏州人民同样经受了上述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的洗礼，并凭借自身的若干条件，使苏州的这段革命实践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紧随全国形势 反响强烈 声势浩大；二、由于早期共产党人的宣传活动和大批有觉悟的知识青年参与，马克思主义在苏州较好地得到传播，广大工农群众开始觉醒；三、苏州党组织建立后发展较快，并从一开始便较注重思想和组织建设，共产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中起了明显的骨干作用；四、由于中共江浙区委和苏州独立支部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动面目有所察觉和防范，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损失较小，党的力量保存较好。

第一章

五四运动的反响和人民群众的觉醒

第一节 反帝浪潮席卷苏州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1919年1月开始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决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代表竟然准备在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5月4日北京10所大学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许德珩等32名学生被捕。一场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斗争波及全国，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苏州日报》、《平江日报》、《常熟明报》等迅速报道上述消息，苏州人民郁积已久的愤怒似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纷纷以通电声讨、示威游行、宣传演说、罢课罢市、抵制日货等方式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学生首起响应。5月6日，苏州学界吴研因等向北京总统府、广州军政府、各省教育会、全国学生及上海报界通电怒斥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发出“当卖国贼群小危害我大学生，全国学校应俱散学，全国学生应与俱死”的口号。5月9日，是袁世凯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苏州各大中小学将国耻纪念活动与声援五四运动结合起来。8日下午，东吴大学召开国耻纪念会，致电北洋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苏州师范学校300多名学生手持书有‘国耻’字样的小旗上街游行，沿途大量散发传单。省立第二女子师范附属学校在集会演

讲国耻痛史之后，全体学生列队前往日本驻苏州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9日下午，东吴大学、省立二中、桃坞、晏成、萃英、英华等校学生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会后，学生手持写有“人心未死”、“国民速起”、“力争青岛”、“毋忘国耻”等字样的标语旗在城内游行。随后几天，各校学生相继于课后上街游行，随地演说，沿途听者甚众，颇能令人油然而生爱国之心。

声援活动中，爱国学生深感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在酝酿成熟的基础上，5月18日，苏州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从此，苏州学生运动由各学校自发行动进入到统一组织罢课斗争的新阶段。5月24日，苏州学联组织2500多名学生集会，通电全国，表示“愿联络全国学界共策进行”。5月27日，苏州学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次日起，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罢课决议被印成通告广为散发和张贴。通告指出：外交失败，内政日紊，学生等呼吁无效，杞忧难已，望绝路穷，痛深虑切。谨于5月28日起一律罢课。

5月28日，全市20余所学校万余罢课学生列队前往观前、阊门等闹市区游行。沿途高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争回山东权利”、“抵制日货”等口号。一路上观者如潮，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罢课行动深得各界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许多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工亦通电北洋政府和南京督军，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平日门禁森严的二女师学生也冲破阻力投入罢课斗争。她们在手帕和香袋上绣上“毋忘国耻”、“抵制日货”等字样，用面粉捏成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的模拟像，煎而食之，以示痛恨。当时各校流传的一首歌曲，充分表达了学生的心情：豺狼当道，猛虎横行，害我中华，几阵炮声，满街热血，一场残杀，有志竟成。休让英魂含冤天下。热泪抛，太烦恼，烦恼，心头似火烧，火烧，有仇必报，必报！

6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面公然表彰

被民众斥之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一面下令取缔学生一切爱国行动，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学生及其他一切爱国群众的愤怒。6月3日，北京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演讲。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有800多名学生被捕。6月5日，上海产业工人六七万人举行罢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舞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五四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移至上海。苏州各界爱国群众的声援活动随之掀起新的高潮。学界、商界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立即释放北京被捕学生。东吴、晏成、萃英、桃坞等教会学校校方下令学生限期复课，并威胁如不复课，将“一律出校，不准停留”。东吴大学全体学生针锋相对，发表散学宣言，实行空校罢课，表示“目的未达，罢课万难中止”。6月6日，全市19所学校的代表针对教育当局提前放假、破坏罢课的阴谋，决定各校学生在放假后，都得在本籍组织学生联合会支会，互通声气，并派代表去上海同全国学联取得联系。二女师学生顾谷若刺臂血书“学生为救国罢课，提前放暑假不予承认”。6月8日，吴县教育会发动小学总罢课，已经宣布罢课的苏州中等学校数千学生再次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

同时，常熟、太仓、昆山、吴江等地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演讲，集会游行，号召罢工罢市，抵制日货，掀起声援五四运动热潮。5月27日，常熟教育会、商会、农会等群众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数千人大会，成立常熟国民大会。28日，常熟学生联合会成立，当天城区学生再次举行游行。6月21日，清华、同济、南京高师等30多所外地大中专返虞学生代表51人集会，成立中国学生联合会常熟支会。这些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常熟各界人士在爱国反帝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第二节 反帝浪潮由学生运动 发展成学工商一致行动

“六三”以后 苏州工人开始参加运动。6月6日 苏经、延龄、三星等丝织厂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接着，日商瑞丰丝厂女工冲破日方严密控制，进行局部罢工和怠工。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和部分内河航运工人相继进行罢工和集会。他们同学生一起散发传单，拒绝装运日货，在车站、码头查禁日货。人力车工人在车子背面挂上标语，勉励学生“坚持到底，勿要五分钟热度”。6月16日，苏州火车站全体工人加入沪宁全线铁路工人罢工斗争，迫使全线停运。罢工斗争不断扩大，苏州城区相继参加罢工的还有火柴厂、梗片厂、造纸厂、面粉厂的工人。

商界的罢市斗争是在爱国学生的竭力敦促下进行的。6月6日，苏州学联派代表去总商会要求各商店一律罢市，以配合学生的罢课斗争。总商会犹豫不决，反而要学生“力持镇静”。7日学联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烈士追悼会。会后，学生列队前往总商会，再次要求商界罢市。此时，上海罢市风潮愈演愈烈，南京、无锡、镇江扬州等地也相继罢市。苏州城内“商界中人，亦到处散发传单，鼓吹罢市”。在这种形势下，总商会决定8日下午3时起全面罢市。常熟的罢市斗争在6月10日开始。县商会规定，除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可根据情况罢市外，其他商店一律全天罢市，并要求各商店门口悬挂“不除国贼，不释学生，不还青岛，不愿开市”的白旗，以表明斗争的决心。

由此，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局面形成。它和全国的革命洪流汇合在一起，终于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将曹、章、陆3个卖国贼撤职，也没敢在和约上签字。6月下旬，斗争胜利的消息传到苏州各地，城乡一片欢腾，“三罢”斗争也

在欢呼声中落下帷幕。

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中学生、商人乃至一般市民出于爱国热情同当时“三罢”斗争并行的一项活动。5月8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苏州的第三天，省立第一师范全体师生致函总商会，“外交危急，民意未伸。同人盼望贵会一致提倡国货，以为外交后盾”。同日，总商会接到上海商业公会函，要求将上海“不装日本船，不用日本货，不用日本纸币”的决定转告苏州市民。此举得到总商会的响应，表示“若有贪利忘义而暗中私售日货，或私自收用日本纸币者，吾各界当共弃之”。接着，学界、商界共同决定，拒用日本正金、台湾（当时在日本统治下）两银行发行的纸币。

5月15日，学生组成演讲队，上街劝市民“不购日货，不用日币，不与日本人交易”。各报馆也联合拒登日商广告。5月下旬，各界组织的救国团、劝用国货团走上街头，为劝用国货、抵制日货奔走呼号。他们深入各商店检查，一经发现日货，立即加以查封。还将竖立在火车站及市内多处日货广告牌砸毁。5月20日，省立第二农业学校将查获的百余种日货集中在炮台营操场当众烧毁，数万参观者“靡不鼓掌称快，互相劝勉”。7月21日，又将查获的几批日货销毁。常熟市民也普遍以使用日货为耻。一些人将日本草帽踩烂、钱包撕毁、瓷器砸碎。浒浦镇耀华药记一艘贩运日本药丸的货船被群众捣毁。沙洲西塘市和杨舍镇联合行动，对查获偷运日货的船只，除了没收货物外，还予以重罚。日本领事馆为此提出抗议，苏州各界不予理睬。抵制日货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20年4月才告一段落。

在抵制日货过程中，发生了一起与日商争夺办电权的斗争。1906年，苏州建立生生电力公司（后改名振兴电灯公司），对市民供电。1918年，该公司以招股为名，暗中将公司出售给日商大仓洋行。一时舆论哗然，民情激愤。许多商店改用汽灯照明，居民十有八九将用电合同作废，宁可点油灯。金阊市民公社提议筹建苏

州电气公司，与日电抗衡。五四运动爆发后，苏州市民中业已存在的愤懑如火上加油。5月17日苏州学联致函总商会指出“市民对于燃灯自应同作抵制”总商会表示“果欲抵制日货当自电灯始”。决定劝导各界，一律停用日电，并招股集资30万元，以加快自办电厂进度。此举得到市民广泛响应，“认购（集资）者甚为踊跃”。8月初资金已基本筹措到位，1920年电厂建成。日资电灯公司无法维持，不得不将产权出让。一场抵制日电的斗争，以苏州人民的胜利而告终。苏州电气公司的成立，充分表现了苏州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

五四运动一开始，以苏常镇守使朱申甫、苏常道尹王可耕为首的军阀当局即采取造谣诬蔑、销毁传单、禁止游行、查拿纠办等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加以阻挠、制止和破坏。而这一切，就像蚍蜉撼树、螳臂挡车一样，丝毫也阻挡不住觉醒了的苏州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阻挡不住潮水般的滚滚革命洪流。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苏州的传播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又是一场以传播科学和民主、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苏州知识青年，尤其是其中的先进分子，通过斗争实践，逐渐认识到，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必须唤起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五四运动后不久，苏州各地出现了演剧、办学、办报、结社等活动。

1919年暑假以后，曾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的省立一师学生汪伯乐、刘铭九等6人，在丝织工人聚居处旧学前文山小学内创办了工人义务学校。招收的主要对象是年长失学的职工。报名者踊跃异常。开学初期就有近百人，不久增加到150余人，依然满足不了入学者的要求，又在录葭小学办了分校。1920年初，又借城西清微小学办了一所同样性质的学校。义务夜校为平民所办，授课内

容有识字、珠算、常识及时事讲评等，很受学员欢迎。汪伯乐等人白天自己读书，晚上为职工义务上课，为宣传新思想，普及新文化作了尝试，也为自己接近和了解劳动群众，日后从事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

五四运动之前，常熟小学教员陈惺轩等组织己未俭德社。入社者多为小学教员、旅外学生及社会青年，会员总数有四五百人。先以宣传崇尚节俭、摒弃不良嗜好为宗旨。五四运动以后，其政治倾向越来越鲜明。它组织的讲演会及创办的夜校所宣传的内容，“大多以介绍新思想为主”。俭德社办夜校在常熟是个创举，一切设备都是借用的，学员多为商店伙友、年长失学的工人及一般贫苦市民。在常熟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孙选和顾近仁等一批知识青年，在沙洲三甲里、西塘桥一带组织青年读书会，排演文明戏。利用庙会宣传民主思想，揭露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利用庙宇、祠堂等公产兴办学校，开展新文化运动。

1919年七八月间，省立一师学生张建初、华有文、龚宝善、朱枕薪、陈德征等人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漫谈时政，探索人生，发现在反帝反封建等重大问题上彼此观点一致，决定组织定名“人社”的团体。不久，华有文等通过友人介绍结识了邵力子、苏爱南、陈独秀。苏爱南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常向“人社”邮寄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小册子。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满腔热情地向“人社”提供了《新青年》、《劳动界》、《工商之友》和《共产党宣言》、《两个工人的谈话》等革命书刊，给“人社”以正确的引导。张建初等利用这些书刊，在校内办起了书报贩卖部，向同学出售、出借各种书刊，吸引不少同学共同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其中一些优秀分子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摒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走上了革命的人生之路。1921年秋，陈独秀介绍东吴大学学生徐雉同华有文取得联系，在潘儒小学

开办工人夜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0年5月叶圣陶在苏州编辑出版《妇女评论》。这是国内最早研究和论述妇女运动的专刊之一。刊物登载《无锡丝厂女工的现状》、《吴江外来妇女生活状况》等文章揭露妇女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鞭挞旧中国的不平等现状。《妇女评论》就妇女解放道路的问题组织讨论，充分表达了妇女解放的迫切愿望。同时，还通过登载叶圣陶自撰评论、小说、诗文，登载正在苏联访问的瞿秋白的专稿，转载《新青年》的文章，介绍苏联妇女儿童的幸福生活，称颂“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实开数百年无数社会主义者理想成功的创始的第一个国”。这对于广大不知道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为何物的人来说，不啻是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1923年柳亚子创办《新黎里》半月刊鼓吹新文化。在《新黎里》刊物的影响下吴江各地先后办起《新吴江》、《新盛泽》、《新同里》等九种新字号报纸，为苏州各县所仅见。

1923年冬，苏州第二高级小学教师顾容川、徐述先、蔡绍襄等，先在草桥中学创办工人夜校。而后，又和东吴大学进步学生费青、宗教界人士毛吟榭等，在丝织工人聚居地濂溪坊白蚬桥创办了苏州第一工人俱乐部（对外称联谊社）吸收300多名工人参加识字、京戏、乒乓、国乐、阅报、交谊等活动。俱乐部邀请共产党员恽代英等人前来演讲培养了葛炳元、张春山、舒正基、陈长和等一批工人骨干。他们在以后的斗争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在大革命高潮中，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到1924年，苏州城区已有工人夜校13所、21个班、学员1200余人。

在新文化运动中，由于苏州同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和现代工业中心上海很近，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成为建党初期一些著名活动家经常来往的地方。他们在苏州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

在苏州的传播 对于唤起群众 发动革命斗争 建立党的组织 促进国共合作都起了重要作用。

1923年下半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沈雁冰为建立党组织多次来苏州考察。

1923年10月14日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启天、杨效春、邓中夏、恽代英、刘仁静、左舜生、杨钟健等 17人在苏州留园举行会议（该会成立于1919年7月 是五四时期最大的群众性进步团体 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赵世炎、张闻天、侯绍裘均系该会会员。同时 也有右翼分子参加）会上 围绕拟订宣言和纲领 以邓中夏、恽代英等为代表的左派对以左舜生、杨效春等为代表的右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取得了论战的胜利。针对右派反对革命实践的谬论 宣言明确主张“到青年中去”。并宣布“本届苏州大会……决然一致以求中华民族的独立相号召，务以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还我自由为目的，同人等为求此目的，决定同人的任务为到青年中去，以鼓吹预备而切实进行民族独立的运动事业”。会议制定的9条纲领，充分体现了宣言的精神，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号召青年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等方面，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否定了右派的错误主张。

年会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没有坚持将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写进宣言和纲领中。这一妥协，为以后右派窃取学会领导权，学会的政治态度倒退，导致学会最后解体埋下了祸根。

1924年初，恽代英应苏州第一工人俱乐部之邀，到苏进行演讲。1925年初，苏州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共产党员刘重民、叶天底等努力下成立，恽代英又应邀到会演讲。同年4月4日 苏州各界3000余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会，恽代英再次来到苏州，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号召民众继承中山先生未竟之业，继续进行国民革命。苏州建党以后，他又多次来苏，以乐益女中为落脚点，在该校及公园图书馆等处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萧楚女也多次来苏州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下半年应侯绍裘之邀，萧楚女在平林中学作演讲。五卅运动后期，苏州各界掀起争取关税自主的群众运动，苏州学生联合会邀请萧楚女、姜长林来苏州作关于关税自主的报告。11月22日萧、姜二位在苏州青年会礼堂演讲“除男女学生外尚有许多平民，一时座位极为拥挤”。1926年初，萧楚女还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吴江等地视察工作。在一封写给林育南的信中，他谈到在吴江同几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接触的情况。

著名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同许多中共党员有亲密的关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至1926年间，应他之邀前往吴江的中共著名活动家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侯绍裘、恽代英、萧楚女、向警予、陈望道、杨之华、沈雁冰、董亦湘、杨贤江、刘重民等。他们或者是单独前往调查研究，或者是联袂前往参加国民党吴江县代表大会，举办讲习班等。有如此众多的党的重要领导人亲临，是吴江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盛事。

第四节 日益兴起的工农群众斗争

20年代初苏州虽然出现了一些现代工业但是作坊和工场手工劳动仍是主要方式。生产环境恶劣，设备陈旧简陋，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资极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无暇东顾的帝国主义势力又卷土重来，工人阶级成为中外资本势力相互竞争的牺牲品。中国资本家千方百计压低工资，增加劳动强度，雇佣女工及童工。工人所受剥削进一步加重，生活状况更趋恶化。以苏纶纱厂为例，工人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而工资报酬仅为：女工每天2角童工每天1角苦力每天1角5分到2角。再以丝织业为例，1923年，苏州有大小丝织厂30余家工人3000多人。各厂制订的厂规及罚款条例多达20余条，一般工人每天工资仅1角5分左右，上班迟到5分钟，有的厂规定罚款3角相当于2天的工

资。出了油渍，罚款 3 至 5 角，断行织一条，罚款 5 角，等等。平时，工人须将工资的一成作为押金。如工人停工，则将押金罚没。超时的劳动，微薄的工资，名目繁多的罚款，加上物价不断上涨，使工人难以为生。至于帝国主义在苏州办的企业对中国工人惨无人道的压迫和敲骨吸髓的剥削更是令人发指。以日资瑞丰丝厂为例，该厂工人上下班都要经过抄身弄，由资本家豢养的走狗对他们抄身，工人稍有反抗，便遭毒打、罚款或开除。厂内那棵老树上，不知吊打过多少中国工人。现在，抄身弄以及这棵老树已经成为外国资本家虐待中国劳工的活见证。

为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罢工风潮迭起。盘门外的苏经丝厂，缫丝女工不仅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而且工资比其他厂更菲薄。工头还动辄虐待和殴打工人。1920 年 6 月 11 日，一位女工横遭工头毒打，激起全厂女工的愤怒，一致将蚕茧倒入锅内，举行罢工。当时正是新茧上市、缫丝最紧张的季节，罢工无疑是对资本家的沉重打击。厂方慌了手脚，威胁利诱，工人不为所动。她们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惩办打人凶手、规定工作时间等三项条件，并表示厂方如不答应，宁可饿死，决不复工。迫于无奈，厂方只得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斗争取得胜利。丝厂风潮未平，织厂风潮又起。丝织业资方组织云锦公所曾向工人许诺，若每石米价超过一百文，即给工人增加工资。当时米价已接近 200 文，资方却毫无动静。6 月 15 日，丝织工人的组织霞章公所致函云锦公所，要求履行诺言，增加工资，并组织全体工人于次日罢工。资方一面口头敷衍，一面勾结警察厅监视和威胁工人，并收买霞章公所代表，从内部分化工人。21 日，愤怒的工人一举捣毁了被收买者的住所，冲进了污蔑工人“无理取闹”的报馆，砸毁了印刷机及门窗、桌椅。警察进行镇压 10 多名工人被捕。22 日 数百名工人涌向县署，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还到云锦公所及王义庄缎庄示威，再次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又有 20 多人被捕。全体工人没